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周大鸣
吕俊彪 著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 区域文化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 区域文化研究

周大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 区域文化研究

周大鸣 吕俊彪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周大鸣, 吕俊彪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12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306 - 02967 - 6

I. 珠… II. ①周… ②吕… III. 珠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 IV. K2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8748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责任编辑: 杨 捷

封面设计: 曹巩华

责任校对: 宗 华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 格: 635mm × 960mm 1/16 18.75 印张 267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1)
一、族群与区域文化	(2)
(一) 族群	(2)
(二) 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	(4)
(三) 族群文化与区域文化的互动	(7)
二、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	(7)
三、本书研究的意义	(8)
四、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理论创新	(11)
(一) 主要问题	(11)
(二) 理论创新	(12)
五、本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3)
第一章 珠江流域族群文化概述	(15)
一、珠江流域族群文化的历史渊源	(15)
二、珠江流域的族群分布	(24)
(一) 壮侗语族民族(百越——壮侗族群)	(26)
(二)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氏羌——藏彝族群)	
.....	(27)
(三) 苗瑶、孟高棉及其他民族	(28)
三、珠江流域多元化的族群关系	(30)
(一) 和谐共融的族群关系	(30)
(二) 生计模式与经济生活的多元互补格局	(32)
(三) 多元交融的文化	(34)
第二章 珠江流域的区域文化	(35)
一、珠江流域的自然地理与人口分布	(35)

二、珠江流域的区域文化概貌	(37)
(一) 珠江上游(云贵高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	(37)
(二) 珠江中游(广西)的族群与区域文化	(46)
(三) 珠江下游(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区域文化	(49)
三、山地族群的区域文化特征	(51)
四、平坝、河谷杂居族群的区域文化特征	(56)
第三章 珠江流域族群社会的田野考察	(65)
一、金保寨:一个蓝靛瑶村寨	(65)
(一) 自然生态环境	(66)
(二) 历史沿革	(66)
(三) 婚姻与家庭	(67)
(四) 经济生活	(68)
(五) 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威	(71)
(六) 教育与卫生	(72)
(七) 禁忌与风俗习惯	(73)
(八) 族群关系	(76)
二、陇法寨:背陇瑶人的家园	(77)
(一) 自然生态环境	(77)
(二) 历史沿革	(78)
(三) 人口结构与婚姻家庭	(79)
(四) 经济生活	(82)
(五) 教育与卫生	(87)
(六) 宗教信仰	(89)
(七) 族群关系	(92)
三、庄子村:城市边缘的彝族村落	(94)
(一) 宣威及庄子村概况	(95)
(二) 人口与婚姻家庭	(98)
(三) 经济与生计模式	(102)
(四) 社会控制与乡村习惯法	(106)

(五) 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	(108)
四、多依村：水边的布依人家·····	(114)
(一) 被“认定”的布依族·····	(115)
(二) 经济生活与生计方式·····	(116)
(三) 多依人家的生命礼俗·····	(120)
(四) 神灵与信仰仪式·····	(125)
(五) 旅游与生计·····	(128)
五、大梧屯：一个仫佬族山村·····	(133)
(一) 自然资源·····	(134)
(二) 经济生活·····	(135)
(三) 生活习惯·····	(137)
(四) 婚姻与家庭·····	(140)
(五) 民间组织·····	(141)
(六) 宗教信仰·····	(143)
(七) 语言与教育·····	(143)
(八) 族群关系·····	(144)
六、长湓村：城中村中的族群关系·····	(146)
(一) 研究背景·····	(146)
(二) 长湓村概况和族群构成·····	(148)
(三) 族群关系和认同特征·····	(150)
(四) 本地族群和外来族群“隔离”的因素分析 ·····	(153)
第四章 珠江流域族群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155)
一、社会结构的转型·····	(155)
(一) 地方社会组织·····	(156)
(二) 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	(157)
二、经济生活的变化·····	(158)
(一) 生计方式·····	(158)
(二) 商品交换·····	(161)
(三) 族群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162)
三、族群文化的变迁·····	(163)

(一) 族群语言·····	(163)
(二) 传统习俗·····	(164)
(三) 民间文艺与民间技艺·····	(169)
(四) 宗教信仰·····	(172)
第五章 珠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互动与整合 ·····	(174)
一、区域经济发展 ·····	(174)
二、族群关系 ·····	(177)
三、区域文化的整合 ·····	(180)
四、文化整合与社会和谐发展 ·····	(185)
第六章 珠江流域族群与区域文化专题研究 ·····	(188)
一、科技下乡与少数民族生计转型 ·····	(188)
(一) 引言·····	(188)
(二) 现代科技与布努瑶流动耕作文化·····	(190)
(三) 现代科技与过山瑶的耕作技术·····	(196)
(四) 结语·····	(208)
二、基督教在珠江流域族群中的传播历史与现状 ···	(211)
(一) 基督教在珠江流域的传播历史·····	(211)
(二) 基督教在珠江流域族群中的传播·····	(216)
(三) 基督教在珠江流域族群中的传播特点·····	(229)
(四) 结语·····	(232)
三、珠江流域的客家人 ·····	(234)
(一) 珠江流域客家人的分布与形成·····	(235)
(二) 西江客家·····	(240)
(三) 东江客家·····	(244)
(四) 北江客家·····	(246)
四、民工流动与族群互动 ·····	(249)
(一) 外来人口与都市新族群·····	(251)
(二) 人口流动与族群互动的关系·····	(254)
(三) 东莞族群互动的主要形式·····	(257)
五、珠江流域的城市化与宗族 ·····	(263)

(一) 问题的提出	(263)
(二) 城市化与宗族变迁研究回顾	(265)
(三) 三个个案	(268)
(四) 结语	(277)
主要参考资料	(281)
后记	(289)

绪 论

族群以及族群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近年来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在关于族群概念、族群文化、族群认同以及族群关系的诸多讨论与争鸣当中^①,族群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较少为讨论诸家所关注。

非西方的、“没有历史”的自然村落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对象。然而,1945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那个聚焦于所谓的“简单的、封闭的原始社会”、着意研究各种奇风异俗的人类学时代逐渐成为过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其本身所蕴含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对于它的研究,有必要超越村落共同体的研究视野,而将其置之于更广阔地域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考察。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历史或民族志研究计划,只有把自己放在较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框架当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②村落共同体的实证研究与区域文化的总体考察的有机结合,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取向。我们试图透过对一些少数民族聚居村寨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同时结合对珠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全面考察,研究珠江流域不同族群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情况,探讨族群与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周大鸣主编:《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美)乔治·E. 马尔库斯、米开尔·M. 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9页。

一、族群与区域文化

(一) 族群

“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据认为源自于希腊文“ethnos”形容词形式“ethnikos”,在14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在英语中,其最初之所指,乃是“非基督教的”、“非犹太教的”或者“异教的”。^①19世纪以后,“族群”之意,在西方世界几乎与“种族”(Race)同义。1935年以后,学术界才将“族群”与“种族”区分开来,成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差别所使用的概念。^②

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认为,族群作为一种文化孕育单位和组织类型,指的是这样一种人群:①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②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③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④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层(Order)的不同种类。^③除巴斯之外,尚有不少人类学者对“族群”这一概念进行过定义,相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认同纳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等人的概括。因为格氏对于“族群”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在其之前的人类学者对于“族群”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而视之为富有地域感和历史感的人类文化群体。格雷泽认为,族群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

① Walker Connor: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 ...*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78, pp. 379 ~ 388; 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② Banton, Michael: *Racial Theo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③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译,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民族的、地理的起源。^①

族群的形成以及族群关系的维系问题，一直是族群问题研究所关注的焦点。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先后出现过强调客观文化特征的“文化说”、以社会边界来确定族群社会空间的族群边界理论、强调原生情感及其生物学基础的“根基论”（Primordialists，又译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由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场景决定的“情景论”（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ts）以及强调现代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现代民族的形塑作用的“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② 这些理论虽然都有着各自的缺陷，但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族群以及族群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事实上，当人的不再无声的合类性从血缘共同体扩展到地缘共同体，即人对自己类本质的认识超越了直接的血缘认同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广泛的、对间接关系的认同之时，民族（族群）、国家等合类性藉以存在的发展方式的形成，也就获得了其最初的基础。^③

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拓展，或可以看作是族群形成和发展的总体趋势，但其现实的发展进程又无不夹杂着内在的变异性以及外在的趋同性。族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内在的变异性，使得以往许多关于族群社会生活的静止不变的想象显得不切现实，而外在的趋同性，也使得那种把族群看作是一种完全自在的共同体的设想，更像是早期一些人类学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社会事实。事实上，当我们放弃那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族群生态状态的理论预设，进而把族群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视为一种可能趋势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很难想象不受区域文化影响的族群，以及没有

① Glazer, Nathan, Moynihan, Daniel: *Ethnicity - Theory and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 潘蛟：《族群》，载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2～357 页；周传斌：《族群理论的流变及其与民族理论的关系》，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 年第 5 期。

③ 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

族群活动的区域文化。

(二) 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

19 世纪末,为了使人们能够一目了然地认识到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和特征,德国民族学家巴斯典(A. Bastian)最先提出了文化区域(Culture Area)的概念,并以之作为博物馆陈列民族标本的一种分类方法。^① 韦斯勒(C. Wissler)在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中发现,当地土著人可以“按照单纯的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进行分组,进而他把这些文化特质划分为许多区域,如食物区域、织物区域、陶器区域等等。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各种特质同时加以考虑,并把视线转向社会或部落单位,就能把它们分成适当和固定的团体,这也就是依照文化特质所划分的文化区域,或按文化团体的分类”^②。在《人与文化》一书中,韦斯勒提出了“文化特质”、“文化丛”(Culture Complex)、“文化类型”(Culture Type)、“文化区域”、“文化带”(Culture Zone)和“文化中心”(Culture Centre)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之上系统地构筑了文化区域的理论框架。他认为,“文化区域”中包括若干个“文化丛”,而“文化丛”又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因此,“文化特质”是文化的最小单位。文化的发展,其实就是“文化丛”由发源地向其周边地区逐步扩散的过程。^③ 梁钊韬等人认为,作为一个叙述性的概念,文化区域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文化的调查和分类,但由于相关学者对于文化区域的划分往往只侧重于地域空间的分类,因而难以厘清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边界。与此同时,韦斯勒等人关于文化发展的观点,由于“忽视了文化传播过程的错综复杂性和吸收一方的自身的文化机制的作用”,未能“真正提示出文化发展的实质和规律”,更看不到“文化区域的多重结构及其发展”,因

① 梁钊韬:《文化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2 页。

② Wissler, Clark: *The American Ind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New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 217 ~ 218.

③ Wissler, Clark: *Man and Culture*,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23; 梁钊韬主编:《文化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2 ~ 173 页。

而与文化传播论的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①

我国学者周振鹤认为,我国的区域可以分为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和文化区域,它们之间相互影响。自然区域是指自然地理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行政区域(行政区划)是指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行政区域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包含历史文化区域的因素。文化区域则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性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②

我们认为,文化区域的讨论,只有放在更大范围的地理区域之中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因为,纯粹意义上的文化区域,不仅难以厘清区域内部文化的多样性特点,同时也无法说明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一问题的根本性难题,似乎就在于,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自然地理区域和族群去研究所谓的文化区域。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在本书的研究中,更主要地是指具体的自然地理空间之中的族群文化的总称,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还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区域。就其内部的组成状况而言,区域文化并不是均质化的文化整体,不同的族群以及不同的文化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性——尽管这种状况的现实存在并不是隔绝它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的主要障碍,也并不排斥区域文化内部所可能出现的某些相近或者相似的文化特征。我们认为,区域文化内部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既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因而是自然、历史与文化的混生物。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在某些特定的地理、政

① 梁钊韬:《文化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② 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转自:区域与旅游规划空间站(www.plansky.net)。

权区域之内，曾形成过许多不同的区域文化。在春秋时期，当时各地的习俗，即有“域风”、“国风”之说。《诗经》中的民歌，就是根据地域性风俗的特点进行收集和分类整理的，故而有“十五国风”之分。一些古代文献探讨了各地风俗习惯得以形成的具体原因。《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自然环境、政治势力以及人的性情对于区域文化形成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近现代学者主要根据地理方位、经济生活状况以及行政区划对我国的区域文化进行划分和研究。梁启超所谓的“亚洲东、西、南、北各自成一小天地”，以及李约瑟对于中国的北方文化、西北文化、西方文化、南方文化和东南文化的文化地域的划分，无不体现这一原则。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托尔斯托夫、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提出了“经济文化类型”这一著名的民族学概念。根据托氏等人的定义，所谓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①林耀华对经济文化类型概念进行了修正，并把我国各民族分成三种经济文化类型组，即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尽管从表面上看，托氏等人对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并没有突出强调自然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就其实质内容而言，这些类型的划分都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区域文化的分类。与托氏等人在区域文化的划分上对于区域的历史、经济与文化的重视不同，李桂海关于我国区域文化类型可以分为河谷型、草原型、山岳型和海洋型的观点^②，则是以地形作为主要的划分依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类似于李氏这种基于地形、地域等自然地理空间上的特点

①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② 李桂海：《对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特点的一点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徐亦亭：《中国古代文化区域和民族关系》，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所进行的区域文化划分方法，虽有简约化的嫌疑，但相对而言，却更为生动形象且易于把握，因而在实证性研究当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采用。

（三）族群文化与区域文化的互动

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而就其狭义的意义而言，我们或可以认为族群文化是族群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族群文化固然具有某些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但我们更愿意相信，族群文化绝不是亘古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一个不断流变的过程。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族群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为族群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持久性的动力。

区域文化虽然可以看作是区域范围内族群文化的总称，但它并不是族群文化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族群文化的某种凝固不变的组合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区域文化与族群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渗透、不断演进的总体与个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互动与交流是这二者关系的重要特征。

二、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

珠江是我国第四大河流，流域面积约 44 万平方公里，包括西江、北江和东江三大支流。西江是珠江的干流，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乌蒙山脉中的马雄山，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四个省区，在磨刀门入南海，全长 2217 公里，流域面积占珠江流域面积的 79.5%，约 35 万平方公里。西江主源为南盘江，至册亨县与来自黔西南的北盘江汇合后称江水河；向东南流至广西石龙镇三江口与柳江汇合后称黔江，到桂平与郁江相会；郁江在南宁一带称邕江，上游为右江和左江，到桂平与郁江汇

^①（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合处以下又改称浔江，直到广西、广东交界处的梧州汇桂江后始称西江。西江源地至石龙为上游，长 1574 公里（包括南盘江长 915 公里，红水河长 659 公里）。西江的上中游为云南、贵州的一部分和广西的大部分，均为民族地区，约 32.9 万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 74.8%。

珠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为复杂，既有云贵高原的山地、平坝河谷，又有丘陵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等沿海河网平原地区。与此相对应的是，珠江流域的人文地理分布也极为复杂，该流域内计有壮族、苗族、瑶族、侗族、毛南族、京族、白族、仡佬族、彝族、水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也有广府、客家、福佬（潮汕）以及“疍民”等汉族民系，这些族群互相杂居，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多元一体的族群分布局面。

本书的研究以珠江的干流西江流域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兼顾东江、北江流域的部分地区。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建构了珠江流域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在珠江流域内部，不仅孕育了南方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族群文化，同时也因应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特点，促进了山地文化、平坝河谷文化、丘陵地带文化以及沿海平原文化等区域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三、本书研究的意义

以往对珠江流域的族群和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研究取向是以行政区域，如以省、州、县或者村寨等为对象进行研究，主要围绕某个行政区域下的族群和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和探讨；另一种研究取向则以民族/族群为研究对象，侧重研究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当然，在一些研究当中，也有采取这两种研究取向相结合的情况。其中，相关学者对于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各民系的研究，对于广西壮族和侗族的研究，对于贵州苗族和瑶族的研究等，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珠江流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由于受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限制，